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一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七九期（zk1906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坚定而艰难的一步（上）	孙怒涛
【当事者言】	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	夏剑彖·高云鹏
【往事非烟】	陪伴爸爸“挨斗”的日子	张小明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坚定而艰难的一步（上）
——我与樊思清的短信、邮件、微信往来

· 孙怒涛 ·

目录

- 一、初交
- 二、深入
- 三、试探
- 四、重启
- 五、突破

2014年初，我正忙于文集（即已于2015年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的组稿。

我希望能约到一篇当年武斗期间的杀手写的稿子，谈谈他们的心路历程，最好能有所反思。我通过熟悉的校友做了其中二三位的工作，但是一个都没有成功。是呀，谁愿意把自己的恶行公诸于世，让子孙后代都知道呢？我对这件事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

王嵩梅是文集的顾问，她知道我的心思。

过年后的某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樊思清？

这名字我不熟悉。当她告诉我他就是枪杀朱玉生的凶手时，我马上就想起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上是有这个名字。

王嵩梅说，樊思清向她要《良知的拷问》。她那里还有，但她建议由我寄给他。我明白她的用意是以此为由让我与他建立直接的联系。

我已多次以我的回忆录作为约稿的“敲门砖”。我立即用快件给樊思清寄了书，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下面方括号里的文字是我现在整理时所加的说明）

一、初交

〔以下均为短信〕

樊思清 2014-03-07 13:01

怒涛学长：您好！

快递门铃解除了期盼，心仪已久的书到了。心里热乎之余回想联翩，烟云过眼事过情迁。上至头头下到兵卒，唯各自心路历程岂能瞒天过海孰能忘尔？对这本书岂是“感兴趣”三字所能包容！回汉以后，是“基督山伯爵”还是“曼德拉”？早已过细考量。我与电机系的校友办过企业，由于过于信任对方未签合同。企业现在成长很好，而我却是白忙一场。我自己后来也办过企业，然而又受了合同欺诈。虽然法院把应付款判给了我，钱还在执行中。原来我自己有训诫，要“远离纠纷，慎用法律”，可命运安排我当了一回被告之后还扮了一次原告！目前我已退休，老伴是大学的退休副教授（是我幼年时的邻居），1981年5月我回汉一个月以内就结了婚……

怒涛学长，恕我多言！我是怕您太忙，或不便接电话才把短信写长了。我会永远积极拥抱未来！我坚信我有好的未来！

再次深表感谢！一定细品“知问”！后会有期。

〔樊思清的第一个短信写得这样长，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般的，收到我的赠书后表示一声感谢就足够了。〕

我与他素昧平生。想当年，他是铁杆老团，我是四派头头，没有任何交集，人生的道路也完全不同。

我从他的短信中感觉到他的真诚、爽直和善意。我立即提醒自己：对他一定要热情、平等和尊重。直觉告诉我，与他的交往不会太困难。）

孙怒涛 2014-03-07 13:51

樊思清：你好！

虽然你忘了具名，我还是知道短信是你发过来的，因为昨天王嵩梅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了。我也在网上查询过，快件已到了武汉，今天应该送到你家了。

很高兴收到你长长的短信。我口音太重，又变得唠叨不已，更适合短信或邮件与你交流。

我向所有人，这次是向你推荐，这本书最值得一看的是前面十位校友的11篇文章。我最有成就感的是由于我的努力把那么多精品佳作奉献给读者！

至于我的回忆录，虽然尽了力，但差强人意。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克服了恐惧，突破了自我，展示了我的真实。清华人写的回忆录，最有资格评说的就是清华校友。很愿意倾听你的批评指正。

握手！

多交流！

祝安好！

老孙

樊思清 2014-03-07 14:10

再谢谢！您一定特别忙，我就是怕打扰您，浪费您的时间精力。我一定好好阅读，并会有阅读笔记的。好！多交流。今天就打住了。我接到书拆开那结实可靠的包裹牛皮纸，首先就是回短信再吃的午饭。我又来劲了！别见怪。此短信请不再回了！再见！

（我遵嘱没有再回他的短信。到晚上，他又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

樊思清 2014-03-07 21:33

捧起这本书，太沉重了！

朱玉生同学，这位从来“不觉相遇”过的，又萦绕在我脑海中四十六年的冤魂再次突然放大，如影片中飞机穿入黑洞般。只是方向相反，是黑洞扑面而来！为了他我被永远钉在了十字架上。在一切的行动、行为、活动，在任何场合，任何情感活动，只要我活着，清醒着，都会扑面而来。钉着！钉着！牢牢钉着！无需牢笼，没有枷锁，就是打不开挣不脱！还需要他人来冷讽热嘲吗？还用得着对我批判和进行阶级斗争监督改造吗？难怪基督徒要到教堂神父忏悔的。

我不相信神只信科学，我要忏悔，今天晚上我就把《良知》这本书当成《旧新约全书》忏悔一次！书中有朱玉生和清华文革的诸多不幸者！面书十分钟！今日必行不可过夜！这只是自己内心的一面。

回汉后回清华后时时还会觉察到外部对我的歧视，包括隐形的和明显的。不是我多疑，我大脑异常清醒概念十分清晰，可是我过来了。所谓歧视是：区别对待而且效果是负面的。在英语里：dis-crimi-nation 分三段：差异—罪恶—抽象名词后缀。还有个特殊现象

（前提是我的所有平辈亲戚都混得不错都处在讲面子讲形象的圈子和环境中），凡是称我伯伯叔叔舅舅的血亲晚辈，都被托了底，都知道我文革的底。凡是喊我姑爹姨父的晚辈都对我讳莫如深。

1990年校庆，我第一次参加量零班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活动，脑子里想到连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敢于来南京谢罪，我为何不敢去京？我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闻亭再下坡卅米朱玉生遇难处默立！我怕同学见面后再来不及过来了。以后2000年2010年连续三次都是如此。其实1990年时同学在表面上都对我赴京聚会表示期待和欢迎，实质感觉确有差异，这太正常了！

今天算是拿您当一回神父不过夜地忏悔了一次。我当然清楚我绝不是日本鬼子！再见！怒涛神父！

此短信绝不要回！我懂的！您是神父那就不是懂的问题了。

（拿到我寄的书以后，他马上阅读起来，这让我很感动。

对于“神父”这个称谓，我感觉有点怪异，因为我早已被教化成无神论者了。但我从他的短信中深切感到他需要交谈，需要倾诉，需要朋友，时刻都在忏悔。我不应该让他失望！

第二天·他来电话与我交谈。他说他头天晚上只睡了一个小时。

短信不是很方便，以后就改用邮件交流。）

（以下均为邮件）

樊思清 2014-03-08 14:22:00

主题：樊思清读《良知》（一）

怒涛学长：您好！

手机短信交流还是不如上机方便。昨天，第一次短信说明了：

（1）书收到，自己受到了校友们的礼遇，心里感觉热乎；

（2）出狱后自己对国家、社会和所有人应该采取的“立场定位和态度取向”；

(3) 回武汉后谋生的大致经历;
(4) 个人家庭组建和生活的社会环境;
(5) 现已退休的定格, 期盼更好未来;
(6) 收到《良知的拷问》就要当作起点“知问”下去, 按照正确的哲学观这是个不断延续的过程。

我给您的那封有关忏悔的后一次短信, 其实并没有忏悔。只是表达了我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强烈的负罪感, 对自己泯灭人性罪恶的恐惧, 对社会“正义气场”力量的敬畏以及法律惩处后所绵绵延续无穷的“受歧视感受”。其中唯独没有站在受害者朱玉生的立场, 自认为自己“罪有应得”的答白和表述。是的, 没有!

这就是被拷问出来的结果吗? 我回答: “不全是”。我完全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感吗? 我回答: “远远没有”。“受歧视感”是报应活该, 很正常不奇怪, 其本身就是恐惧感的派生品! 我在这一封短短的短信里就能做到自我突破吗? 我回答: “不可能”。这封后一次的短信是否展示了我的真实呢? 我回答: “是的, 是真实的, 还远远没有表达完”。

我先后两次出差到了江苏盐城附近, 都由于恐惧而不敢探访朱玉生的老家。我也对朱玉生的父母端不端得住朱玉生的骨灰盒, 家庭的后续状况有过各种设想(当时土建系和动农系都住在二号楼, 朱玉生的父母就在二号楼一楼楼下的中间门洞, 紧靠西边的第一间屋。工宣队把我安排在一号楼四楼去住, 并且告诉我去五饭厅吃饭时一定不要经过二号楼。我当时还极其幼稚地说去当面向他父母跪下认罪, 工宣队师傅把我狠狠骂了一次)。朱玉生的安葬地点在哪里? 由于首先没有这个胆量, 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和机会询问。这是否也是 4 1 4 的一个秘密呢? ……

所以真正的忏悔只能是后续的实际行动并表现为不断自我突破的认识过程。主要应该体现在对祖国对社会对所能接触到的人的补报诉求和言行。已回武汉三十三年, 当然樊思清也言和行了三十三年。

良知和拷问互为因果, 相互归纳, 相伴而行。可以用语言表述清楚, 指导人们的言行。

而“忏悔篇”主要不是说写而成, 只有实际行动才能真正体现。

说到最后自感奇怪, 我昨今两天所说内容, 从来都是在自己的大脑里, 最多说过“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在量零班里, 在 2 0 1 0 年 4 月与蒯大富单独会面 8 0 分钟时都没有谈及。这难道就是《良知的拷问》力量所然吗? 看来忏悔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内心活动层面, 还是要用语言来归纳梳理清楚的(我们是用汉语作为思维工具进行思维的, 语言表述不清楚只能说明还没有想清楚), 还是可以被《良知的拷问》这种外部条件所激发的。

这封邮件您完全可以给清华校友看(对象由您自己判定), 我不忌讳! 至此我又轻松一截! 敬请

指正!

樊思清

二零一四年三月八日

(他不回避他曾经犯下的罪行, 他已经好几次主动提到忏悔。这太重要了!

当其时, 我只是想到他正是我物色了好久的撰稿者。但我知道, 现在还远不是约稿的时候。我与他必须先要互相了解、熟悉。我希望他通过我的回忆录对我有基本的信任, 成为朋友。)

孙怒涛 2 0 1 4 - 0 3 - 0 8 1 5 : 0 7 : 0 9

樊思清: 你好!

昨晚收到你的短信, 遵嘱, 未给你回信。事实上, 我思绪万千, 夜不能寐, 也无法回信。今早起来, 再细读之, 我感觉, 回不回信, 在两可之间。因为, 你都能自处的。

知道你的名字，把你与朱玉生联系起来，那才是几天前的事情。王嵩梅告诉我，说你对《良知的拷问》一书感兴趣，她那里没有了，叫我直接给你寄一本。我很高兴，很愿奉赠。我对所有对此书感兴趣的朋友都表示感激。我对你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说句实话，我对当年是谁打死了谁并不太感兴趣。陈志堃的名字以及把他与钱平华联系起来，是去年才知道的。谁打死了杨树立？谁打死了杨志军？我至今都不知道。或许，别人告诉过我，我没记住。

我可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们的恶行一直记在我心头。我没法原谅他们！文革是罪恶的，他们是文革罪恶的具体体现者。文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必然的，因而他们也必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这意义上说，武斗期间的樊思清已经并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个樊思清，早已经死了！不可能也不应该再让他复活！我想，你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今天我与之通信对话的樊思清，是已经受过法律的惩罚，已经悔过自新，已经良知复萌的樊思清。今日的樊思清，与那个死了的樊思清，只是名字一样，肉身相同，而灵魂，则已在炼狱中重生。他与我是人格平等，可以促膝谈心、称兄道弟的好校友！

如果没有文革，我们那批清华学子中不可能有杀人犯（以后的人生道路，那另说了），个个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但是，没有如果。

因为文革，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疯狂年代里，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几乎都有所扭曲，良知有所蒙尘。当然，这里有程度之差，有量质之别。我们一方面不能回避对自我的拷问（我把我的回忆录当作是我的忏悔录），我们更应拷问造成人间劫难的根源何在！

我上面的想法不一定正确。我们互相讨论、交流，以诚相待。

老孙

2014年3月8日

樊思清 2014-03-08 15:28:13

刚刚打开电脑，初读两遍，表示完全接受。也容我细细再读，再想。

樊思清 2014-03-08 16:47:35

主题：虽然您对当年是谁打死了谁并不太感兴趣，但这是历史，必须记录。

（此处，他用了三百多字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胡远、赵德胜、孙镇井、廖光乾的情况。）

我也是不易落笔，短信都是即兴而成。我平时不管是写什么文件，包括技术文件也不能即兴。更何况是触及自己灵魂深处的伤疤。

您不了解我的其它也很自然，但即便如此，寄一本这样的书给我看，与我互通了这样的短信也不会有大错的。

我可以告诉您，回武汉以后我一直是自闭的，从来没有打开心扉与人（当然是同辈人，我的老人走了）谈过。我感觉到要真正打开心扉谈话，一定是处在和谐平等的氛围。您今天理顺了思维，把今天的樊思清与昨天的樊思清在理论上分开了，这才开始有继续谈下去的理由。昨天您作决定发了短信，可在您的心里，那是开冷枪打死我的亲密战友的凶手啊，我怎么了！

可我呢，我也在想我正在做什么？有什么意义？1981年回汉以后家里一片惨不忍睹，我也没有去找任何校友请求帮助。为什么自己在生活上已经软着陆，退休了以后还要去联系校友呢！

樊思清 2014-03-08 17:26:23

主题：只有时间和事实才是最终的裁判

以下是您说的话：

“今天我与之通信对话的樊思清，是已经受过法律的惩罚，已经悔过自新，已经良知复萌的樊思清。现在的樊思清，与那个死了的樊思清，只是名字一样，肉身相同，而灵魂，则已在炼狱中重生。他与我是人格平等，可以促膝谈心、称兄道弟的好校友”！

只有以上表述被证实，才能构成我们今天能够往下对话的基础，我记住了！谢谢您！

但是我樊思清真正如是吗？还没有盖棺论定啊！

只有时间和事实才是最终的裁判。

我建议我们对话和讨论的脚步可以放慢一点，讨论的人员范围尽量先小一点（这个由您任意判定，我就是我，没有第二人），以等待时间的验证和事实的补充。等待现实转变为历史。其实还是“盖棺论定”比较科学。

可是我可要说一句：您是值得信赖的“诚信对话可放心”对象。我深信不疑。

我有勇气先把话放在哪里保存起来，待时间和事实来辨其真伪。今就这。祝顺利！

回到武汉的樊思清

2 0 1 4 • 3 • 8 1 7：2 3

孙怒涛 2 0 1 4—0 3—0 8 2 0：3 2：0 7

樊思清：

“今天我与之通信对话的樊思清，是已经受过法律的惩罚，已经悔过自新，已经良知复萌的樊思清。现在的樊思清，与那个死了的樊思清，只是名字一样，肉身相同，而灵魂，则已在炼狱中重生。他与我是人格平等，可以促膝谈心、称兄道弟的好校友”！

以上是我说过话。是我从你的短信里感觉到才写的话。

于我，不必等你盖棺定论。我现在凭的是我的直觉。

凭着这一直觉，我愿与你真诚交往下去。

我相信，时间和事实会证实我的直觉。

你也同样可以用时间和事实来证实我是不是一个值得你交往的人。

你建议的“我们对话和讨论的脚步可以放慢一点，讨论的人员范围尽量先小一点（这个由您任意判定，我就是我，没有第二人）”

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我也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不想扩散。

你下午的来邮都收到了。我发现你很能写东西，思路敏捷，我有点跟不上。

你的来邮我会记得回复的，但很可能会延误一点时间。

老孙

2 0 1 4 年 3 月 8 日

（2 0 1 4—0 3—0 8 2 1：0 0 樊思清来电话，与我交谈近 4 0 分钟。谈及他的工作，他的家庭、岳父，他的悔恨，他做好事、救人等等）

二、深入

孙怒涛 2 0 1 4—0 3—0 9 1 7：2 0：5 0

主题：值得赞许的人生态度！

樊思清：

我非常高兴地在短信里看到、在电话中听到你这样的话：

我会永远积极拥抱未来！我坚信我有好的未来！

一个受过重大挫折的已经奔七的男人，还有这样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对我很震动！

我几乎没有听到我的同龄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心态。

当然，你要付诸行动，要实现它，并不容易。

一个犯过罪的人回归社会后，客观上必然会受到某种歧视。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不能期望每个人都那么宽厚（要是放在几年前我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宽厚），总有冷言冷语。而自己格外敏感的神经也往往会把别人的无心之言听成有意之语。

有的人选择远离社会远离朋友默默地生活，有的人选择埋头做好事善事赎罪一辈子，有的人只埋怨自己的命不好运气不好自叹自哀。失去自由的囚徒生活是有期的，而无形的镣铐可能会戴到生命的终点。

每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是自己的自由。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着生活的质量，人生的价值——这对所有人都一样。

我坚信你会永远积极拥抱未来！你有美好的明天！

共勉之。

老孙

2014年3月9日

樊思清 2014-03-09 21:23:04

昨天，晚和夜，看孙耘写的一段，太相似，但我比他掉得更深！今天一天做家务等等时，一直在想：

（1）老孙在我的问题上抉择很难，这个人为什么遭遇到了鬼樊思清？

（2）鬼樊思清难，不想放弃，但想放缓。

老孙为什么是这种人？鬼樊思清为什么到68岁还自寻“换魂”呢！

老实说，起步抬不起腿啊！我此前只是想用有益于大众的发明创造来拥抱未来的！我去监狱，有一个运气，学会了机械设计，比一般人手艺好。出来以后也是一直亲自带头搞设计带制造，参观和临摹过各种制造工艺，尤其是在条件极其贫乏的条件环境下搞制造。我现在与刚刚出来时已是大不一样了（以前理想主义，搞过什么“三维围棋”——6口气堵死一个子的专利等等好几个）。现在实际得多。光是现成可实施的产品就有好几个。我才敢讲那种话。我生怕时间短暂不够用，所以我天天锻炼身体。

我（阶梯式开发），第一个产品开发出来花不了几个钱。我最没有把握的事是营销环节。

可是今天细细想来，鬼樊思清在没有彻底转变为樊思清之前，发明创造的力度再大表示的又是什么呢！（此时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好像是选择，暂时远离同学、朋友默默地干产品，贡献出来后大家看得见，我也不会刻意去炫耀。只要：对大众有用，出狱后又没有再干坏事，满足矣！——的这种方式。

先写这些，请您先看。

鬼樊思清

即日即时

我去跑步了！怒涛学长！每天一个多小时，此时出发。我一般来说，没有任何娱乐，不烟不酒。除了干活就是锻炼！几十年如一日！

孙怒涛 2014-03-10 11:52

主题：不喜欢你自称“鬼樊思清”

樊思清：

谢谢你告诉我胡远、赵德胜、吴慰庭这些人那么多的情况。这些情况以前我基本上都不知道。

你说“回武汉以后我一直是自闭的，从来没有打开心扉与人（当然是同辈人，我的老人走了）谈过”。

我认为自闭的状态和心态是很不好的（我在清516以后也有过一段时间很自闭）。首先是对自己的健康不利。要是你能从自闭状态中走出来，你每天跑步一个多小时对健康的作用将会成倍地发挥出来！

你说“我感觉到要真正打开心扉谈话，一定是处在和谐平等的氛围”中。对此我十分赞同！因为我同样有过与你一样的需求。

让我们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一起来营造一个和谐平等的氛围。我的心扉对你敞开，你的心扉也对我敞开，好吗？

我不喜欢你用“鬼樊思清”的自称。在武斗期间的樊思清，那确实是鬼樊思清！你鬼迷心窍了！现在你是堂堂正正的樊思清！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需要寻找的，那个附在你身上的“鬼”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不能把这个“鬼”揪出来现出原形，那是“鬼”的胜利，你这辈子白被“鬼”给害了！

我们都被“鬼”害过！当然，程度不一样，但是“鬼”是同一个！所以，揭露“鬼”、批判“鬼”，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当年常说的一句话——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既然我们是战友，是校友，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您”，“怒涛学长”来称呼我。我更喜欢更习惯大家叫我老孙。这也是平等氛围的一部分哦——

老孙

2014年3月10日

樊思清 2014-03-10 23:29:07

老孙你好！

既然如此，那就打开心扉，直接靠题吧。

《良知的拷问》使我们相知，相识。厘清原则，构成共识，很快入深，触及心灵。

你很累，我也累。为了良知我们彼此且自我地拷问着，拷问之余良知萌新，节奏过快了！

我觉得应该遵循认识事物的规律：“学习—实践—总结—认知”这个反复的过程。

这本书我要细读，过去我要反思，现实生活我们都要过。在目前，我们彼此应该给对方留出一个“静默期”，深入学习思考，再来交流。时间段拉长了，表面上拷问的强度降低了，可能会更加深入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奔七会奔到这样一个难解的“百慕大三角”中？难道是自己的求知天性使然吗？

我不会逃避思考的，我是愿意反思的。

发明创造搪塞不了过去，也不能完全交代未来！升华灵魂不靠上帝还靠我们大家。

我想，其最终标准应该是：我能够和大家一样去直面一切！

我究竟能够走多远，不但要靠我自己的灵性，还靠大家扶持！

樊思清

2014年3月10日

樊思清 2014-03-11 21:58:13

老孙：你好！

一切遵嘱。对你的称呼，我自己的称呼等等都如现在所用。

很过意不去，让你受累了。你若有事，或要休息，暂时别管我这方面的事，正如你说，樊思清自能处之。切切！顺祝

一切好！

樊思清

即日

孙怒涛 2014-03-11 22:35:31

主题：有一个静默期，长短随你。

樊思清：你好！

我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的因子，也有恶的因子。绝对纯粹的善和绝对纯粹的恶都是没有的。大多数时候，善占上风。大多数人，也是善占上风。真实的世界应是如此。

一个人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善恶之比是动态变化的。取决于外部条件，也取决于个人修养。在文革年代，恶被诱发因而普遍上升，道德普遍滑坡。

你我是同时代的，又都是清华的，彼此情况基本相近，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在文革中，我有亏心之事，而你一时邪恶压倒了善良，铸下了大错。但是，正如我前面讲的，你是一时的恶，并非恶之已久。法律的惩罚使你猛醒。灰尘抹去，良知会复苏。回归社会，你就是好人。

法律的作用是惩罚违法者，也就是惩罚心中的恶，复萌心中的善。

那些回归社会后牢记教训不再犯法的人，我认为法律的惩罚已经起到了作用。

像你这样，回归社会以后，有发明创造有舍己救人去报效社会，那是做得很好的了。

有错之人，往往都有悔过之心。有罪之人，也往往有赎罪之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赎罪的形式是多样的。怎么做，看各人的具体情况。你有知识有技能，人又聪明能干，发明创造造福民众，肯定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赎罪行为啦！

当然，赎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除了你的发明创造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式让你的灵魂更升华，让你积善更多。

最后，赎罪完全是自觉的。没有人强迫你必须这样那样才算赎罪。

都到了68岁了，奔七了，罪已经赎完了，日子过得挺平静的，还有必要自己撞进这个“百慕大”吗？这点你要想清楚。我的这本书会撩起你心底的不平静。如果你已经习惯已经满足你原来的生活，我倒是觉得，我这本书，这类书，甚至有关文革的一切信息，不接触也罢。要不，我打扰了你平静的生活和宁静的内心，我会深有歉意的！

仅从这一点而论，你有一个静默期，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不懂你的专业。但是我对你的创造发明，对你的舍己救人的事迹很感兴趣。给我聊聊这些吧，轻松些，也愉快些。

老孙

2014年3月11日

又及：

正在写回信，又收到刚才的来信，一并回复了。

与你交流，我是很高兴的，也是自愿的，我会处理好我的事务，请勿挂念，也不必过意不去。

我说你是能自处的，就是说，我相信你无论是对外面的还是对内心的风浪，你都能应对自如的。

（我在这封信中说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式让你的灵魂更升华，让你积善更多”，就是在为我向他约稿下点毛毛雨。）

樊思清 2014-03-14 00:51:55

老孙你好！

来信看了三遍，说得很细，完全赞同。我得想清楚，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绝对不能辜负你们！

你们的确是情操很高的人，相比之下我羞愧。我深知你们是在帮我。

我的目标是：能够大方而自然地站在校友中间，并能够直面一切。

几天来樊思清占用了你们大量的时间精力。那是你们在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了以后挤出来的“净时间”啊！（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减去吃饭、洗漱、睡觉等刚性过程，才能够挤出“净时间”）。

让我们都互相静默一段；恢复原来的节奏吧。

我说“静默期”，但在我内心是不会静而不思的。

这次就不用再回了，真正沉默一段。

樊思清 3月13日凌晨写（现在已是14日了）

（此信后面他给我写了800多字建议我“站立上网”，我略去了。他说这是他出于衷心希望我健康的良好愿望！）

孙怒涛 2014-03-15 12:52:17

樊思清：你好！

我等不是那些“日理万机”的中央首长。退休闲散之人，最多的就是时间。另一面的意思是，最少的也是时间——毕竟距人生的尽头不远了。所以，想做的、可做的、能做的事情，趁着现在手脚还能动弹，思维还没有老年痴呆，应该抓紧做，才少留遗憾。

我们是校友、朋友，彼此交流，谈不上谁帮谁。要说帮助，也是相互的，都从交往中受益。

你前次曾问到，朱玉生的安葬之地是不是也是414的一个秘密？我特地问了朱玉生班上的同学，他们说骨灰由他的父母带回家了。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我的目标是能够大方而自然地站在校友中间，并能够直面一切。

做了错事，没有内疚感是不行的，过重的内疚感也是不必要的。释放内疚感的最好办法是对受害者，对别人，对社会多做好事善事。心地光明了，内心就坚强了，就能大方自然、光明坦荡地立于天地之间、世人面前。我想你目前已经基本做到了。

老孙

2014年3月15日

樊思清 2014-03-18 02:42:32

万分感谢孙怒涛把朱玉生被父母带回故里的悲惨故事镌刻在樊思清的灵魂深处！

它是一盏灯，扫射了过去的黑暗，探照我今后的道路，至此也算是我的一个“节点”吧！

谢谢您孙怒涛。

我的确想为众人做好事。“众人”即指大众，从而避免了“为人民服务”的高调。

自我感觉“好事”已经被我琢磨成熟，还未问世。“需要”，“实力”，“机会”三者具备才可一气呵成。反省过去，开创未来都需要时间精力，所以我感觉时间精力有些紧张。

至于我的信件，是寄给你看的（内有82年的文件复印件）。

本来可以用手机或数码相机照相后上传到电脑，然后通过邮件传送。这虽然是最简单快捷的办法，但是一来我怕你看不清楚，二来也不太正规。

这次我寄给你，仅是让你了解一下而已，并不是希望你做点什么。我觉得胡耀邦的思想是极其超前的。

今后我会适时与你交流的，即便有时有邮件没有很快答复也请不必误解。让我们之间都互相轻松随便一些。祝

一切好！

樊思清即日

孙怒涛 2014-03-19 16:02:10

樊思清：你好！

对于“人民”一词，我与你强烈共鸣。本来，“人民”是个很好的名词。文革以后，我开始很少用它，回避用它了。

首先，“人民”已经被当局如包二奶一样的包用了。从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公安、人民法院到人民币，名义上好像都是我的，实际上都不是我的，与我这个人民的一分子不搭界。

其次，一想起“人民”，总是同时想到它的对立面“敌人”。这些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敌人”（即每个运动中产生的5%）在“人民”专政下的非人生活令我深感战栗。

所以，我宁愿用“民众”（有时候用“国民”、“大众”）来代替“人民”。

你“的确想为众人做好事”，我坚决支持！

“反省过去，开创未来都需要时间精力；所以我感觉时间精力有些紧张”。对此，我亦充分理解。对于七十上下的我们来说，真正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到躺在床上苟活的时候，除了寿命上的意义，不能算是人生的有效时间了。）

你说“自我感觉‘好事’已经被我琢磨成熟，还未问世。‘需要’，‘实力’，‘机会’三者具备才可一气呵成。”你的这层意思，不够明示，我没看明白。可能这是你心中早就有的想法。

我认为，“需要”是一种判断，我可以帮你判断现在是不是已经被“需要”。“机会”多指外部条件，看看我能不能在机会的创造上助你一臂之力。而“实力”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只是“实力”是不是足够，外人的意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说到为大众做好事，我觉得有一件好事是值得你去做。如果你能做，做成功，其意义，对你，对大众，不可估量！

做这件好事，需要“勇气”和“机会”。机会我可以提供。对你来说，只需要勇气！

我所说的勇气，不是一点点勇气就够了，而是需要超凡的巨大勇气才行！

只是，我不知道你想做的“好事”与我建议你做的“好事”是不是同一回事。

你有没有看过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书里有两节是专门写朱玉生的：（1）7月4日——朱玉生之死；（2）众学友帮助朱玉生的家人。

书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樊思清在1995年和2010年校庆返校时，自己还谈起过这件事。这两次他都表现出了很深的忏悔，表示无法面对死者和死者的家人。他出狱以后，回到武汉，先是搞表面喷涂，后来又做过健身教练。”

老孙

2014年3月19日

樊思清 2014-03-20 01:15:20

来信已经读过几遍！

我现在不仅仅是樊思清一个人。

尽管老人（父、母、岳父、岳母——他们都是清白一世甚至一世英名的人啊！）皆逝去；

但是我现在还有好多活着的人：之夫，之弟，之兄，之伯，之舅，之姑父，之姨父，……

请你容我暂时缓一缓！

好吧！今天就说到这里。

孙怒涛 2014-03-20 10:32:05

充分理解！

我静默ing……

樊思清 2014-03-21 00:50:36

感谢老孙。

理解万岁。

我在考虑：难道“静默”也存在两个分支吗？爆发或灭亡？

孙怒涛 2014-03-21 21:27:48

碰到两难的抉择，向前走一步的，世人谓之勇敢；往后退一步的，世人谓之明智。哪一种是正确的？我曰：听从内心的召唤！因为，良知在内心！那样，无怨无悔，不会患得患失。

樊思清 2014-03-22 01:35:32
收到！且看和想了。

〔交流到现在，我感觉静默一段时间以后我可以试探他有没有可能为文集写篇文章。〕

（未完待续）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当事者言】

#### 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

• 夏剑彘 • 高云鹏 •

1966年5月25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赵正义、宋一秀、杨克明、夏剑彘、高云鹏和李醒尘七人。七名作者中，聂时为系党总支书记，赵为总支副书记，宋、夏、高、李均为哲学系青年教师，杨克明本来也是哲学系教师，但“国际饭店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调往中国科学院电工所了。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自发的支持和有组织的反对，针锋相对，斗争非常激烈，形势相当严峻。6月1日毛泽东做出决定：要求“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这张大字报，特别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北大这张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使大字报影响到了全国，起到了在全国发动群众性文化革命的作用。

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它是北大，也是哲学系长期党内斗争，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长期党内斗争的延续和结果。李清崑在电子杂志《记忆》第225期上发表的《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对此做了详细分析。文章说：“我认为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北大内部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所长期积累的多种矛盾不断叠加的产物，特别是北大社教运动之后长达七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整肃社教积极分子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化的产物。这是大字报产生的第一位的原因即根本原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传达，是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决定性条件”。我们非常同意这个分析。在我们这篇回忆文章里就不再重复，以节省大量的篇幅，而仅就自己亲身经历，回忆这张大字报写作的过程。

酝酿和写作大字报是从5月22日开始的。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下午，北大党委向党员干部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副书记赵正义听取了传达。5月22日晚，聂元梓、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夏剑彘、高云鹏在20楼杨克明家

聚会，由赵正义根据记录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赵正义一边传达，聂元梓一边补充。在这之前，批判“三家村”已经如火如荼，“五·一”劳动节彭真没有露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听了赵、聂的传达之后，更加确认彭真和北京市委出了大问题，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北大社教运动和“国际饭店整风会议”的案翻过来。并对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予以揭露和批驳。具体怎么办，采取什么方式？经过讨论，当时提出有几种做法：一是给报社写信，但我们的意见能否及时上报到党中央，没有把握；二是写小字报，贴在北大党委办公室的院子（即四院）里，但这样做大家不易看到，影响不大；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还是写大字报好，可以把大字报贴到校园里，影响大。

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聚会是我们六个人？这六个人都是参加长达七个月之久的“国际饭店党员整风会”的北大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国际饭店会议”说是“整风会”，但其目的就是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要把哲学系的社教运动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他们的这一意图，在“整风会议”初期，暴露得尚不太明显，但随着会议的进展，特别是到中后期，这个意图就暴露无遗了。

我们有幸看到有关社教运动的一批原始材料。这批材料对于研究当年那披段历史是弥足珍贵的。据原北京市委干部李×在1967年3月的长篇揭发材料披露：

（1965年）九月下旬，邓拓指使我说，要整理出聂元梓的单行材料，把过去工作中的表现，讲课中的问题，在经济系时的问题，整风社教运动中的表现统统收集起来，题目就叫《一个浸透了剥削意识的老干部聂元梓》。

九月廿八日，邓拓在市委大楼他的办公室秘密召集彭珮云、王庆淑、刘文兰和我等开黑会，亲自策划王庆淑的反攻倒算发言。……邓拓策划：张恩慈是哲学系的害群之马，社会主义北大不要他，思想斗争也要刺刀见红，座谈会后放一天，再刺，再放再打，把张恩慈撂倒。

十一月十九日，邓拓来国际饭店找陆平、宋硕、彭珮云等策划下一段的倒算计划，邓拓突出地强调说：要把王庆淑的旗帜举起来。……叫王庆淑上第一炮，敌人这里开刀，就从这里顶，理直气壮。聂的材料要切实砸死，现在她靠上告打气，是回光返照，……我把邓拓要开座谈会的事告诉了宋硕，他同彭珮云等拟了一个名单，记得有陈××、王××、冯××、谢×、徐×、赵××、张××、柯××、高××、徐××等。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市委大楼邓拓的办公室召开了这个黑会，陆平、宋硕、彭珮云、李康林、刘文兰等也参加了，会上主要是邓拓讲的，……他说：这次整风开始就宣布过有两种党性，聂、孙等现在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党性，抱成一团，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将来事实会证明，聂用的就是拉拢，威胁，打气，许愿等手段拉成一个集团，现在看是与党完全对立的小集团。

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市委大学部干部陈××，在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刘文兰（北大党委干部）屋里看到了图书馆学系史××写的一份反映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议论校党委问题的打印材料，刘即指着这份材料说：“他们就是搞非组织活动，就是反党集团。”（引自原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陈××1967年3月的揭发材料，此材料当时印15份）。

根据会议印发的简报统计：专门召开揭批聂元梓的大会就达45次之多。会议领导小组的作为，引起了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与抵制，他们据理反抗，使得会议组织者的阴谋难于得逞。

直到1966年2月，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到北京市委，特别是直接烧到“整风会议”的领导者头上。他们自顾不暇，只好草草结束会议，把他们想要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以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名义下放到北京郊区，化整为零，而且不许他们再回到北大，也不许再回到市区。用陆平的话说：积极分子下放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是，聂元梓因病休养暂时未能下放；由于党务工作需要，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得以留系里看摊子；因教学工作需要，宋一秀和高云鹏必须留校授课；杨克明已经调到科学院电工所，暂时还住在北大的教师宿舍里；夏剑多已经下放到昌平，正好家里有事请假回到北大。其他积极分子都已经下放，不在北大，所以只有这六个人参加了这次聚会。

聚会时，大家确定写大字报以后，又讨论了写什么内容，由谁来执笔的问题。大家认为，大字报的内容应该围绕着文化革命方向的问题。因为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让北大的学生去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以证明海瑞是否平了冤狱。并以此为典型在北大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企图把文化革命引向学术讨论的方向，必须揭露他们的阴谋。关于执笔人，因为在此之前，宋一秀、赵正义曾应《解放军报》社之邀，写了一篇关于文化革命运动方向的文章，大家就推举宋一秀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起草大字报。

5月24日晚，仍是我们六个人在杨克明家里讨论宋一秀写的大字报稿。先是宋一秀把他写的大字报稿读了一遍。大家听后觉得大字报稿篇幅较长，重点不突出，不够尖锐有力。之后就如何修改大字报进行了议论，聂元梓、杨克明等都说了些具体意见，最后大家推举杨克明修改大字报。杨克明表示：连夜修改出来，第二天一早去科学院电工所上班前把大字报稿交给高云鹏。

5月25日晨，杨克明去电工所上班时，顺路把大字报稿给了住在24楼的高云鹏。高云鹏拿到稿子先叫同住24楼的宋一秀一同看稿子。这份稿子吸收了宋一秀大字报的内容，和大家讨论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大字报的结构和文字是杨克明重写的。宋一秀和高云鹏觉得这份稿子方向明确、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战斗力很强，写得很不错。然后，他俩就分别通知赵正义、夏剑多过来，在宋一秀屋里讨论杨克明的稿子。四个人一起对大字报稿做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上没有改动。后来聂元梓来了，她看完稿子在最后加了一段话和三个口号。此后大家又一句一句审核，通过一句夏剑多和高云鹏就各自抄写在大字报上，也就是同时抄写了两份大字报。之所以要抄写两份，是因为考虑给校党委提意见，就要贴在党委院子里一份，另一份准备贴在大饭厅东墙上。

大字报抄完后，我们就陆续签上了名，第一批签的有赵正义、宋一秀、夏剑多和高云鹏。第一个位子留给了聂元梓，她当时外出有事，回来之后就在第一位置上签了名。杨克明当时不在，为了能及时把大字报贴出去，高云鹏就在第四的位置替杨克明签上了名。因为大字报是杨克明修改完成的，把他的名字签上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已调到科学院电工所工作，不是北大的人了，签上他的名字或许有些不妥。

大字报抄好并签了名之后，觉得签名的人少了点，但是好多人又都不在学校。后来想到李醒尘就住在24楼一楼，他平时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于是就由宋一秀去一楼找李醒尘，当时他正在午睡。把他叫上来，他看了一遍抄好的大字报，欣然同意，并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就成了七个人。接着李醒尘便同赵、宋、夏、高一起去贴大字报了。

大字报贴在大饭厅外的东墙上，时间是中午1点钟左右。这时正是学生要去上课，工作人员要去上班的时候。大饭厅前是交通要道，贴大字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围观。后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很大，所以就用不着再往四院党委办公室院子里贴大字报了。贴的这

份大字报是高云鹏抄写的那一份，夏剑多抄写的那一份就没有贴出来。6月1日之后，这份大字报不记得是哪个单位以留作档案为由要走了。据说这份大字报现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他们是从中央办公厅取过来的。

大字报贴出以后，很快就有了反响，支持大字报的比较多，其中很多是哲学系同学写的大字报。这和哲学系同学的政治敏感有关，也和大字报的作者在同学里的影响有关。但是，到五点钟左右，反对的大字报突然出现了，来势凶猛，还贴了些大标语，显然是有组织的行动。不仅出现了围攻大字报的情况，也出现了围攻大字报作者的情况，校园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高云鹏5点多钟到大饭厅去看大字报，被人认出是大字报的作者，不由分说就把他挟持到第二教室楼南边的一间平房教室里，展开了围攻。他们不让高云鹏说话，高一张口他们就喊口号，这显然是有组织的围攻，领头的是一个校团委的干部。赵正义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带领哲学系学生赶去支援。那位团委干部感到情况不妙，连忙下令撤退，随之一哄而散。

5月25日晚差不多12点的时候，华北局李雪峰书记（6月1日公布他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书记）来了，他在办公楼礼堂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讲话，没有对大字报内容的对错表示态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也到北大来了。张彦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贴大字报可以，但是不要贴在外边，要“内外有别”。此后贴大字报的地点就改到31楼后边的第三食堂。食堂里拉了很多绳子，大字报就挂在绳子上，很快食堂里就挂满了大字报。

当时我们觉得斗争不会很快结束，这个期间我们也不能沉默，于是就决定不断地贴出大字报，把斗争坚持下去。我们的第二张大字报，记得是在宋一秀原来大字报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大概是在6月1日也挂在了第三食堂里。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就多了，原来同情我们的哲学系的教师们也都纷纷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上了名。

6月1日晚饭前，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们：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有重要消息，让我们注意收听。那时电视远没有普及，重要新闻都是通过晚上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发布的。那天全校的大喇叭都响了起来。原来是广播的这张大字报。我们听了广播心情无比激动，像是得到了解放。次日《人民日报》刊登这篇大字报时，又发表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评论员文章的旗帜这样鲜明，对北大党委、对陆平、彭珮云的定性这么上纲上线，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从这一天起，燕园沸腾起来了，我们从被打击的对象一下子变成了被人瞩目的人物，北京大学成了大家争先恐后要来的地方。外校的学生、机关的干部，工人、农民，乃至外地的也不远千里，络绎不绝地到学校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当年，除聂元梓、赵正义之外，我们都是普通的年轻教师，对当时中央上层的斗争不清楚，也不可能知晓。我们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之后，我们最初想的是：我们这下可以翻身了，再不会被打成“反党集团”、被开除出党了。而大字报被毛泽东利用，进一步在全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巨浪，造成十年之久的大动乱，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这的确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一事，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本不想再谈及此事。然而，多年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中央理论调查组曹轶欧授意的，是康生、曹轶欧幕后策划、指示“泡制出来的”。对这种说法我们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加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聂元梓回忆录》（第115～117页）里说：在我们已讨论决定写大字报之后，她曾和杨克明一起，经中央理论调查组张恩慈联系，见到了曹轶欧，向她请示、询问，是否可以给北大党委、陆平贴大字报，曹回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谈话并未涉及大字报的具体内容，要写些什么？怎么写？仅仅是“可不可以贴大字报”而已。要在北大校园里公开给校党委书记贴大字报，事关重大。聂元梓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按党的组织原则，请示一下上级领导，只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更稳妥而已，这是很正常的事。谈不上曹轶欧“指使”，更谈不上是康生幕后策划、指示“泡制出来的”。我们集体讨论决定写大字报、写什么内容在先，聂元梓向中央理论调查组询问在后。《聂元梓回忆录》里说：她和杨克明请示曹轶欧的事，回来向我们说了，这是她记忆错误。在我们写大字报的整个过程中，聂元梓从未透露过她去询问曹轶欧一事，我们还是后来看到她的回忆录时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也就是说，我们写大字报没有任何人授意，没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们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和北大的实际，自行讨论、决定，并付之行动的。这就是我们亲历写大字报的历史事实。

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佐证：大字报贴出的傍晚就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晚饭后夏剑矛曾去一院找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张恩慈（他住在一院），向他反映大字报被围攻的情况。张当即批评道：“你们为什么让聂元梓第一个签名？！你们不知道树大招风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央理论调查组并没有指使聂元梓，让她牵头写大字报。

以上就是我们亲历的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过程。我们两人都年逾八旬，我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本着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把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实写出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供文革历史研究者参考。

夏剑矛 高云鹏 2018年9月1日

◇ 附录：大字报底稿“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



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赵正义 宋一秀 杨克明 夏剑彖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作者简介：夏剑彖：1935年6月生于哈尔滨市，1955年9月考入北大哲学系，1960年5月留校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获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云鹏：

1937年2月1日生于河南开封。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现为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基础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职称为研究员。1997年退休。）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往事非烟】

陪伴爸爸“挨斗”的日子

• 张小明 •

父亲（1906～1970）张敬人，四川省自贡市人。原上海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母亲（1924～2004）朱锷，江苏省靖江市人。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新四军。“文革”前，任上海市医药公司政治部主任。粉碎“四人帮”后，调到上海市电影局复查组工作，曾任上海市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

◇ 替父亲写材料

我写回忆爸爸的文章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原想让妈妈能看到这本纪念册，但未能如愿，这也成了我最大的憾事。拖延是主要原因之一，我曾多次提笔都未能完成，因为这块内心深处的伤疤实在难以彻底揭开。这是烙印最深的一块，也是在爸爸回忆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下定决心：即使流着眼泪也要将这段历史写出来，这是我陪伴爸爸朝夕相处、共度患难的日日夜夜。人生中会遇到无数酸甜苦辣，但大部分早已忘怀，可这些发生在40年前的“噩梦”，却仍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中。

1966年下半年，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疯狂年代。当年我是南京航空学院三年级学生，很快就被“革命”潮流卷入到红卫兵的行列之中。学校以高干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为主体组成了第一批“黑字”红卫兵，是站在打倒“封、资、修”前列的革命造反派。爸爸那时任上海工学院党委书记，对运动的过激行为虽然不太理解，但多年的组织观念和坚定党性使他确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不可质疑，他在信中经常还支持我的“革命行动”。但当我11月份随着“革命大串联”队伍转到上海时，体弱多病的爸爸已被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折腾得筋疲力尽了。那时全国各地的斗争锋芒已直指各单位的第一把手，爸爸对革命小将要自己承认是“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也想不通。他痛心地说：“我们跟党抛头颅、洒热血干了几十年革命，不就是想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么，即使犯了一点路线错误，也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的认识问题，怎么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好心地劝导爸爸说：“我在各大城市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将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进行批判了。既然刘少奇都成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这些基层干部不也成了走资派吗？”我还开导他：“这个罪名已是当前最轻的了，就别和造反派对着干了。”我怕爸爸挨批斗，就极力劝他委曲求全。可没料到，“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造反派对老干部的批斗逐步升级。担任革委会主任的爸爸也被造反派当作革命对象进行批斗了，还威逼他承认许多莫须有罪状。父亲天天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也无法得到安宁，他还要写无数份检讨。为党忠心耿耿革命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他实在想不通！他不仅为自己处境深感痛心，更为党和国家的命

运而忧虑。父亲那颗坚强的心脏曾受过国民党多次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却经不住是非颠倒、恶意中伤的群众运动中那重重地一击。一天晚上，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检讨时，因心肌梗塞被送往华东医院抢救。那里有全上海医术最好的医生，他们用有效的进口药进行全力抢救，爸爸终于顽强地挺过来了！但面对那残酷的现实，妈妈痛心地说：“虽然爸爸的命被救过来了，但却使他遭受更大的折磨，还不如让他安静地离开这混乱不堪的人间。”妈妈的话得到了验证，父亲从此经历了长达4年难以忍受的漫骂和惨无人道的折磨。

从死神那边回来时的父亲是一个十分虚弱的重症病人，身边必须有家人细心照料。可妈妈也是天天挨批斗的“走资派”，根本不可能来陪伴爸爸，而他们的大儿子还远在阿尔巴尼亚留学，两个弟弟还小，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就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责任。在“停课闹革命”的空闲期间，我正好呆在上海，陪伴爸爸度过了一年多终身难忘的岁月。

爸爸虽然基本脱离危险，但他被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折磨得十分虚弱，更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和休养。每天他必须强打精神，应付一批批造反派、红卫兵的“审问”。华东医院大门形同虚设，那些佩带着各式各样袖章的造反派能毫无阻挡地进出这个华东地区医术水平最高的医院。爸爸虚弱得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拿笔的手也抖动得很厉害。所以我不仅要日夜照顾爸爸的生活事宜，还兼任了他的“秘书”。起初，我白天喂他吃饭、服药，抽空帮他写那些没完没了的检讨，后来，就成天写全国各地前来调查的旁证材料。父亲参加革命工作长达40多年，经历复杂，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结识了大量战友和同志，如今他们都成了批斗的对象，在全民“审干”运动中，他又成为那些老同志的见证人。但无论父亲怎样如实回答，都无法令造反派满意，这群混蛋昧着良心说胡话，企图把所有的革命干部都打成“叛徒”、“特务”，所以在病房里成天都充斥着刺耳的吼叫声。那期间，我替爸爸写了无数份旁证材料，而且全是由我代笔签名的。直至“文革”结束后，还有不少单位找我进行核对。

◇ 陪父亲一起批斗

刚开始陪父亲那段日子，我时常还能在晚上回家看看妈妈，家人也能及时了解爸爸的病情和相关情况。热情善良、耿直豪爽的妈妈见爸爸身边有我这个女儿细心照料，当然比较放心，但她并没因此而省心，她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老同志身上了。当她得知在华东局工作的几位老战友被外省、市的造反派围攻得连家都不敢回，竟毫无顾忌地将他们藏到我们家，三、四位“客人”住了十几天。那时她天天上班也要被挨批斗，却拿出被克扣得所剩无几的一点工资，让老阿姨天天给这些伯伯炖鸡汤、补身子。母亲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罪过”，可她毫不胆怯地“我行我素”。我也经常在晚上到他们指定的地点去传送秘密“指令”（华东局机关人员都分散在各处），每次出家门，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那样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还用暗号与别人接头。这些伯伯都是和爸爸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他们身处危难时还相互关心、相互鼓励。当父亲知道母亲这一危险“壮举”时，毫无责怪之言。他太了解妈妈为人了，他也希望能用此办法保护更多的老同志。我曾暗自得意地对那些造反派说：“你们这群小兔崽子那斗得过革命经验丰富的老党员啊！你们还差得远呢！”华东局在我们家的“联络点”因工作电话太多而被上海市电话局造反派怀疑上了，那几位伯伯怕我们受牵连，赶紧搬往其它驻地。

随着派别争斗的不断激烈，造反派对爸爸的“批斗”也越来越厉害，几乎天天都有穿军装、佩袖章的各派红卫兵肆无忌惮地冲进病房，将重病卧床的父亲拖去批斗。医生试图用革命人道主义去说服这些斗红眼的“疯子”，但一切言行都无济于事。他们只能将一些抢救药交给我，并嘱咐我如何通过搭脉来判断病情并及时给病人服药。那时我22岁，也是个大学生，却要站在大学礼堂的台上，陪爸爸一起接受和我同龄大学生的批斗。我有意穿着和他们

同样的军装，挎着黄色军用书包，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是医院造反派的小护士。我从未经历过那种激烈的场面，起初还真有些害怕，但看到父亲坚定而又镇静眼神时，就勇气十足了。我用力搀扶着爸爸，就像跟随着他走向敌人刑场似地，有一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我们走进响彻口号的会场后，我就将那些发疯的人群置之度外，全神贯注地照顾爸爸。我强硬地要求他们让爸爸坐在椅子上；要求给我倒一杯开水；紧张地看着手表给爸爸搭脉、数着心跳次数；小心翼翼地将从医院带来的急救药给爸爸服下。当台上的人歇斯底里地逼问爸爸“是否走资派”时，爸爸用极其微弱的声音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可台下乱哄哄的人们根本听不清，主持人无奈地要我当“翻译”。我毫无惧色地拿过话筒，用爸爸那种语调坚定地回答：“我不是！”那些人气急败坏地冲着我高呼：“打倒保皇派”。不知为何，身居“轰轰烈烈、人山人海”的批斗现场，我一点也不害怕，只想尽力照顾好爸爸，多替他声辩几句。在台前看热闹的群众见我若无旁人、专注照顾的平静神态议论纷纷地说：“这是什么人？不像是他的女儿，否则怎么受得了呢！”

在那个噩梦般的日子，我陪爸爸经历了无数次批斗；造反派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狠毒。起初他们还允许爸爸坐在椅子上挨斗，后来就改为一条破旧的长条凳，最后他们竟拖着无力行走的父亲，恶狠狠地把他扔在台上；我只能蹲在爸爸身旁给他喝水、吃药。看到亲生父亲遭受如此“待遇”，我万分痛心和悲愤，但我不愿在他们面前掉眼泪，硬把自己当成爸爸身边的一个“小护士”。我和父亲都怀着坚定的信念——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每次送爸爸回家，见他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便会憋不住满腔的愤怒和委屈，经常在给爸爸喝完妈妈精心熬制的鸡汤后，一个人躲到楼下的小房间里，发泄地痛哭一场……

◇ 为父亲忍辱负重

华东医院已无法对爸爸进行正常治疗，因为他们承担不起病情如此严重的病人在外面随时都会发生意外事故的责任，医生无奈地给我们配了很多药，劝我们回家休养。

1967年6月的一个深夜，寂静的马路被一辆满载红卫兵的大卡车搅得鸡犬不宁，他们像强盗似的破门而入。那时，我晚上就睡在父母卧室内的阳台上，以便照顾父亲。听到门外阿姨和造反派剧烈的争吵，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即将卧室的门紧紧锁住。门外的人大声训斥：“张敬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由于我们家的住房是解放前法租界的楼房，门板很厚实，他们使尽办法都推不开。我就隔着房门向他们宣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章，并反复声明：如要抓人，必需出示公安局的证件！此时，我看见爸爸处在这样危急、混乱的环境里，却冷静地闭着双眼，坦然地躺在床上，我被他那种熟悉而又坚定的神态深深地感染了，心中默默地说：“爸爸，女儿一定会陪伴您，坚强地面对这场强烈的暴风雨！”

门外的嘈杂声渐渐地平息下来，我还以为这群混蛋无奈地撤走了，想抓紧时间休息，可没等我安睡，又被急救车刺耳的警铃声闹醒。只听见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们又来了！他们杀气腾腾地拿着一把锋利的斧头准备“劈门抢人”。后果可想而知，我的薄弱身躯那能挡得住这些强盗行径。厚厚的门板终于被砍倒了，一群人蜂拥而入。起初我还拉着两个人还想据理力争，但两位身穿白大褂的人径直冲到床前，将瘦弱的爸爸抬起来就往楼下跑。我这才意识到：他们是在抢人！我顿时就像发疯似地用手奋力推开面前那两个人，直冲楼下。我们家的楼梯上站满了造反派，墙上被黑墨水涂满了醒目的标语口号。有人在故意阻挡我的去路，但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我一路挥舞着双手“打”了下去。等我冲到大门外时，只见他们已用担架把爸爸推进救护车里，眼看就要关门了，我急得什么都不顾上了，拼命拉着门把，并将一只手往门缝里伸，硬要他们开门。有人拼命拽着我，不许我上车，我见路边已有围观的群众，就有意地大声叫喊：“他们抢人啦！”一些好心的大妈上前

责问：“她是他什么人？为什么不让她上车？”我赶紧回答：“我是他女儿，我爸爸生重病，还不让我跟着去。”在众人的谴责下，他们不得不开门让我上车了。在这次冲突中，爸爸为鼓励我上大学给我买的那块“上海牌”手表被车门压裂了（至今我仍细心地保留着这块有意义的旧表，而且一直没有更换那块有裂纹的表面，以示纪念）。爸爸睁开眼睛，深情地看着我，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阵阵警铃中，我们离开了那满街、满墙涂着大标语的巨鹿路853号（我们的家）……。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会把我们送到何处。后来才明白，原来是被送到造反派有关系的医院，他们想隔离爸爸。那天晚上，在爸爸任党委书记的那所大学里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据说还打死人了。学校造反派就把“当权派”视为手中的“秘密武器”，想通过独自控制，对付另一派。

救护车伴着警铃开进了一所医院的急诊室，里面的值班医生见救护车进来，匆忙地奔了出来。我抢先跳下车对那些紧张的医生大声嚷：“没什么急病，是他们半夜把人抢来的！”气急败坏的造反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爸爸抬到急诊室的病床上，当医生询问病人病史时，那些不让我开口的造反派根本说不清，一位医生强调说：“送到这里的都是重病人，要听家属讲述病情！”我得意地朝那位不知所措的造反派狠狠地瞪了一眼，一边讲述父亲的病情，一边有意声明：“我父亲一直在华东医院看病的，病历全在那里。”可能接诊的医生不是他们事先联系的人，所以他主张应将病人转送到华东医院。这批造反派哪是为给我父亲治疗啊，他们只是看他病重，怕承担责任，就通过关系秘密地送到这所医院里。可能医生之间也有分歧：自己单位都被派别闹得不可开交，哪有精力去处理其他单位的矛盾！随车来的造反派急着四处找人，我们就冷冷地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拖到中午吃饭时，只见医生、护士都去食堂就餐，看守我们的人也吃饱回来了。因为我们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离家的，身边没带一分钱。那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大学生“看守”可能触动了一点怜悯之心，主动要借钱让我去买些食品。依我的倔脾气，宁愿饿死也不会向他们妥协、求饶！可我不能眼看着极其虚弱的父亲和我一起挨饿，他再也经不起折磨了！我勉强向那人借了一点钱，到医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小袋饼干，并向医生要杯开水，权当我和爸爸的“午餐”。过了几个小时，大概是他们“谈判”失败了，造反派只能又把我们送回华东医院进行住院隔离。

这次是关押性的隔离，不允许我回家，更不许其他人进来探望，造反派对我们进行24小时的监管，连医生、护士都不能跟我们说话。但只要在这个医院里，我对爸爸的病情就放心多了，因为我坚信：大部分医务人员对老干部还是会尽责尽力进行医治的！白天，我只能给爸爸反复朗读《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和《毛泽东语录》，晚上，躺在另一张小床上却难以入眠，母亲不知道我们的下落，肯定要急死了；家里被砸成乱七八糟；里里外外的大标语什么时候能洗刷干净……

第二天，打扫卫生的勤杂工小吴悄悄地告诉我：外面有人找。我赶紧找一个借口到走廊的另一头，只见我家老四（小鲁）穿着一身黄军装、佩带着红卫兵袖章混进来了。原来妈妈见造反派用救护车抢走的，就急中生智地让他先到华东医院打听消息。那天，一向坚强的妈妈眼看体弱病重的丈夫和年轻气盛的女儿落到一群流氓、强盗手中，急得都快发疯了，她昼夜焦虑不安、心急火燎。我故作轻松地对小鲁说：“没事了！有我陪在爸爸身边，让妈妈放心吧！别着急了！”

◇ 我给父亲当“翻译”

我父亲曾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上海的地下党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关押。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经党组织全力营救出狱，此后继续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党组织审查了多次，十分清白，并早已下过结论：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并在狱中仍负责党支部的工作，勇敢地组织战友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这段历史却被造反派肆

意颠倒，别有用心地强加了“叛徒”的罪名，他们断言：“国民党不可能那样仁慈地放你出来。”父亲当时使尽全身的力气，给予有力地反驳：“这决不是国民党的慈悲，而是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才取得释放政治犯的局面！”由于他们费尽心机也找不到丝毫所谓的证据，竟采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段欺骗广大群众。记得有一次，他们拿着录音机来逼问爸爸。由于父亲体质虚弱，讲话经常口干舌燥需要喝水，在他回答问题时，我必须用汤勺不停地给他喂水。当时造反派问：“你是不是叛徒？”爸爸坚定地回答：“我不是叛徒！是党组织把我营救出来的。”后来，他们对爸爸进行了一次缺席的批判，特地要我去现场“接受教育”。没想到，他们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将爸爸的录音进行了肆意篡改，把爸爸回答中的“不”字洗掉。他们还将我用汤勺喂水时碰到杯子的声音特地放大，并给我也加上莫须有罪名：“他女儿蓄意破坏我们的革命行动。”当时气得我真想跳到台上，揭穿这群王八蛋的阴谋诡计。但我要被他们抓起来，谁去照顾父亲呢？我不得不将这天大的委屈憋在心里，也无法对爸爸如实相告。我心里明白，为党革命40多年的父亲是怎么也无法接受这样的颠倒黑白。虽然父亲经受着从未有的打击和屈辱，但他仍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群众暂时的过火行为，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后会为他们老干部平反的。他还心平气和地开导我：“我们这些老党员应该为年轻人的培养做些贡献，就作为他们练武的枪靶子吧！”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些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干部、老党员真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一群穿着军装、系着皮带的红卫兵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紧医院，他们拖着爸爸就去批斗。我来不及问，用最快的速度，将医生事先给我备用的抢救药装进随身背的小黄包里，紧跟爸爸迎战这场“狂风暴雨”。押送我们的卡车在夜幕中飞驰，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望着他大义凛然的气概和坚强而又镇定的眼神，我的心情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我搀扶着爸爸步履艰难地走上一个在学校大草坪上搭起的“批判”台上，透过刺眼的灯光，我看到台下挤着黑压压一片情绪激动的人群。我和爸爸意识到：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将会被带上更多的反革命“帽子”。守在父亲身边，我已丝毫没有原先那种难以控制的气愤和冲动了，反而有一种“站在舞台上观察这群跳梁小丑丑恶嘴脸”的痛快之感！在一浪高一浪的“革命口号”声中，主持人终于让爸爸开口了。他声嘶力竭地发问：“你是不是叛徒、特务？”爸爸用那虚弱声音坚定地予以了否定的回答。由于台下秩序太乱，人们根本听不清楚爸爸的语音，他们齐声要求“再说一遍”。看来大部分群众还是想了解事实真相的。所以当主持人无奈地要我“翻译”时，我毫不犹豫地抓起话筒、憋足了浑身的劲儿，向广大群众宣称：“我不是叛徒！更不是特务！”台上的主持人气急败坏地将斗争矛头指向我，他挥臂高喊“打倒保皇派！”他们知道，在“缺席批判”时，声称我父亲已“承认”罪行的谎言不攻自破了！现在他们只能用“革命口号”来掩盖自己内心的空虚。此时部分群众似乎想进一步弄清事情的真相，台下此起彼伏地响起“让他说话！”的呼声，弄得主持人不得不让爸爸再回答：“被俘后是怎样出狱的？”。我为了让他们难堪，有意不当“挨骂的翻译”，急得台上的造反派只能求我协助他们“革命”！终于，我抓住这个机会，把爸爸在敌人监狱里如何坚持斗争、在国共合作时期被党组织设法营救出来的事实公布于众了！虽然在这次大会上，爸爸又被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但我们却进一步确信了造反派手里连一点伪造的材料都没有。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些人经不住折磨，或为解脱自己昧着良心诬陷好人，不少老干部都曾被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伤过。

◇ 父亲最后的岁月

陪同爸爸参过无数次批斗会，也遇到过很多动手打骂的造反派，但我们无法也无权去问清他们的姓名，只能在短短的接触中，判断他们是恶意中伤的坏人，还是稍有同情心的好人？在运动结束后期清查阶级队伍时，我们根本提供不出那些人的名单，不少作恶多端的坏分子也因此没能受到公正地惩罚。在“清理几种人”政审期间，不少部门先后到我当年工作

的上海交大了解情况，被查人员都是即将出国培养或准备提干的骨干分子，他们的档案中都有“‘文革’造反”的记载，中间很有可能就有当年对父亲拳打脚踢的人，但我实在没有录音或录相等证据进行确认。我父亲是在被关押期间含冤而死的，我很想“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解心头之恨！但父亲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品格在我们子女身上已潜移默化了，我没有凭感情用事，而是理智地处理了这些问题。我相信爸爸生前经常用浓重四川口音说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也相信。那些人如有一点良心，做了这么多坏事也会终生不安的。

爸爸病重被批斗时，造反派起初让学校医务室的医生坐在后台，以防万一。那些医生在阵阵辱骂声中坚持给爸爸量血压、听心跳，并及时给他服药。有一位大夫见爸爸血压高达200左右、心率也常达140次/分以上，完全是个高危病人，但爸爸能用惊人的毅力经受住如此大的折磨，让他暗自佩服，他曾悄悄地对我说：“单凭这一点，我就相信你父亲没有问题，否则早吓死了！”但当那位正直的医生大胆地向主持人提出“不能让病人这样开会”的意见时，立即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还被勒令“靠边站”！

我在医院里陪伴父亲度过了漫长的300多天，亲眼目睹了我们敬爱的父亲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屈辱。父亲曾举着镰刀斧头在农村领导过农民起义；冒过生命危险在上海领导工人、学生运动；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国共合作时，他接受了党的重任，机智勇敢地打入敌人心脏；在苏区的游击战中，他曾领导群众锄奸除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在各条战线上都忘我地勤奋工作……。可这40多年的革命工作却被指责为“罪状”，我实在想不通，曾含着眼泪安慰爸爸：“以后您什么都别干了，我们一定会好好服侍您！”可爸爸那时还是不顾个人恩怨、顾全大局地认真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会有人被误伤，如果不让我再干领导工作，看大门总行吧！”这是爸爸教育我们的一贯观点：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看门”、“扫地”都是革命工作。爸爸啊！在您最委屈的时候，丝毫不埋怨自己的党，在遗书中还担心影响我们的情绪。在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您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组织早晚有一天会给老干部平反的。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不但经常遭到本单位造反派的肆意批斗和辱骂，还经常受到全国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蛮横无理的讯问和责难。找他调查、核实的人员络绎不绝，而且他们经常是带着“定罪”的动机来取证的。为了对老战友负责，他经常锁紧眉头、绞尽脑汁地努力回忆几十年前的一些情景。最让他痛苦的不是肉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打击。父亲如实提供的那些证词经常使那些造反派深感不满，而遭受到变本加厉地训斥，他从这些人的只言片语中能初步判断出那些老战友的处境都不好，为此他又增添了几份忧虑。因为爸爸无力提笔写字，起初，他提供的大量旁证材料都是由我代笔写成的。我每次写完后，他都求我一字一句读给他听，经常会认真地修改。后来在单位隔离期间，造反派有意不将他口述的材料不给他过目，还拽着他的手强硬按下指印。父亲担心这些造反派可能会恶意篡改自己的原意，致使那些老同志蒙受更大的冤屈，他为此十分不安。在给组织留下的那份遗书中，父亲怒斥了造反派类似威逼“杨白劳卖女儿”的强盗行径。在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父亲仍在为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和战友们的处境而忧心忡忡。

那期间，在极度压抑的环境里根本无法正常生活，我和父亲每次才吃2两主食的一份病号饭。因为咽不下干饭，我们整天喝稀饭，最多再吃几口馒头。爸爸消瘦的身驱躺在病床上显得更加单薄，只有深嵌在眼窝里的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地看着乱世中发生的一切。我长得越来越像爸爸了，黑黑的眼圈里同样深深地嵌着一双大眼睛，原本的双眼皮便成了“三眼皮”，体重也降到了最低“记录”——84斤。我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纪念照”，并开玩笑地对家人说：“以后就拿这张照片作为我的遗像吧！”我们父女虽然共同生活了20多年，但因平时各自忙着上学和上班，没有多少时间能亲近。陪父亲的这段日子里，我总算有

机会和爸爸朝夕相处，为他洗脸、擦身；给他喂饭、喝水；能24小时守护在他身边，尽一份女儿的孝心。遗憾的是，我们父女两不能畅所欲言地充分进行交流，而经常是“相对无言难开口”，我只能在爸爸耳边反复念着毛主席语录……。

1967年年底，他们不让爸爸在医院住了，他被拉到单位自设的“牢房”进行隔离。母亲担心我这个风华正茂的女孩子可能会遭到欺负，无奈之下，她含着眼泪将刚满17岁的小儿子（小鲁）送进“牢房”去陪伴爸爸。小鲁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他怀着极其压抑的心情陪伴着爸爸，在那间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度过了异常悲惨的日日夜夜。多年来，他一直不愿向任何人详细讲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也不忍心催他写出这段受尽屈辱的经历，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将一些“狱中情节”记载下来。

自从被隔离，父亲就无法得到医生和护士的及时照料，每天遭受不停地审讯和折磨。为了坚持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他以惊人的毅力，并用各种方式在不到10平米的“牢房”里坚持锻炼，顽强地熬过了两年。那期间，爸爸经常和学校其他“牛鬼蛇神”一起被拖到尘土飞扬的大操场上“示众”，由于他虚弱得无法站立，小鲁就让爸爸坐在板车上（他一直提着车把），陪着爸爸一起挨斗。父亲还经常被拖到草地上，在烈日炎炎的高温下，强制接受“拔草”的劳动改造。小鲁想帮他拔一些野草，却被那个狼心狗肺的“看守”踢到旁边。在单位自设的“牢房”里，连按时送饭的“待遇”都没有，每天要等那些“看守”吃完饭后想起时，才会打开“牢门”让小鲁去食堂买饭。那些造反派经常聚在一起寻欢作乐，常把“犯人”的生活所需置于脑后，小鲁为此经常用力敲打、呼喊，常常是到食堂后已过了点，被食堂工人责难和辱骂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有一次，小鲁好不容易到食堂买了一盒早已凉透的饭菜，返回路中却遇到一个混蛋，他抢过小鲁手中的饭盒恶狠狠地扔到地上。血气方刚的弟弟为了保全爸爸，只能强忍屈辱、含着悲愤的眼泪将沾满泥沙的饭菜捧回饭盒。当爸爸看到儿子那满脸的痛苦和所剩无几的饭菜时更加难受……最令人发指的是，那群混蛋绞尽脑汁也弄不到爸爸是“叛徒”、“特务”的半点证明材料，在外界已逐步“解放”老干部的呼声中，他们感到骑虎难下、不好收场了，竟然对他们父子动用了残酷刑法：他们将小鲁的双手吊起来抽打，威逼他承认“爸爸是叛徒。”小鲁勇敢地据理力争：“我爸爸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那时我还没出生，怎么能证明他那段历史呢？！”他们气急败坏地把小鲁拖到父亲面前，用“毒打儿子”这一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威逼父亲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的父亲曾为革命蹲过二次国民党的监狱，那时他能挺着胸、昂起头，言辞义正地痛斥法西斯、反动派的罪行。可如今，面对着一批批高呼革命口号的红卫兵小将却无法进行申辩和抗争。在那处处是无法无天的动乱日子里，共产党的干部可以被任意打骂，群众之间也在相互践踏，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天理和公理更无处可讲，面对这一切父亲也许只有可气又可悲了！

当年无数老干部的家庭都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身居领导岗位的父母都毫无例外地被推到大批判的前沿。无数孩子被这颠倒黑白的恶浪冲得晕头转向：有些子女在一无家长照看、二无生活来源的困境面前，束手无策地投奔亲朋好友；少数子女被革命口号感染得失去了理智，竟以造反派的身份与被批斗的父母划清界限。改名改姓的在当时的“革命行动”中时有发生。但像我们这样陪着父亲站在“批判会”台上的子女还真不多。运动初期，我也因头脑发热，在就读的大学里轻易地相信了大字报中对党委书记等当权派的“揭发”和指责，对他们进行批斗。但回到家中就无法理解别人对父母的肆意毁谤了。毕竟我们在父母的培养教育下生活了几十年，太了解他们了。所以不管外界怎样诬陷，我都一直坚信：父母是被冤枉的，他们是好人，是真正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工作一辈子的老布尔什维克！所以我们甘心情愿地陪同父母共度难关。

在我1968年大学毕业前夕，成了典型的“保爹保娘派”而被学校、班级的造反派轮番批斗。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因对我早已恨之入骨，将一大堆污蔑、诽谤我的材料交到我班造反派手中，所以在既不上课又不学习的大学校园里，我成了他们每天革命的对象。我面对这些同窗多年的同学们并没有认错，反而理直气壮地讲述父亲的革命经历及如何被诬陷的情况，并针对那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进行申辩：“我是应对方造反派的要求才当爸爸的翻译，否则他们连大会都开不下去”。

在我毕业鉴定里，被定为“犯立场性错误的走资派子女”，并被发配到安徽省铜陵县的一个小煤矿“劳动改造”，在那个穷山僻壤的山沟里接受了5年“工人阶级再教育”。

亲爱的爸爸未能坚持到动乱结束就含冤离开了我们，陪伴他“挨斗”的日子成了我和爸爸相处的最后记忆……。

□ 摘自《中学生的文革岁月》（第一集）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